在陈云同志革命文物捐赠仪式上的讲话

2021年9月30日

朱佳木

在举国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年和全党热烈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氛围里，我向南通革命纪念馆郑重捐赠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党和国家久经考验的卓越领导人陈云同志的生前遗物。南通市退伍军人事务局及革命纪念馆对此高度重视，特意举行了这场捐赠仪式。我认为，这无论对庆祝党的百年华诞，还是对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用好红色资源，传承红色基因，把红色江山世世代代传下去”的指示精神，都是一个很有意义的活动。

我捐赠的陈云同志遗物，是一套米色毛料中山装。这套中山装是陈云同志夫人于若木于2002年整理陈云同志遗物时，特意把我叫去，送给我留作纪念的。她对我说：这身衣服是陈云同志上天安门时穿过的。意思是说，这套中山装是陈云同志当年为出席国庆典礼和其他重要场合而定做的，是他在那时最好的衣服。从《陈云画册》的照片上也可看出，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他在重要场合穿的毛料制服基本上是两套，一套深色，一套浅色，而浅色的正是这套米色中山装。对此，我深受感动，把它视为最可宝贵的革命文物珍藏在家；同时，也一直在考虑如何使它能发挥出更大的文物价值和社会作用。

经过反复考虑，我最终决定把陈云同志的这件珍贵遗物，捐赠给家乡的南通革命纪念馆。其中原因有以下四点：

1. 陈云同志生前虽然没来过南通，但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作为江苏省委和江南省委的领导人，曾直接参与过对南通地区革命斗争的指导，并同南通地区党组织的负责人有过多次直接接触。1927年，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为了反抗国民党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实行的屠杀政策，我们党进行了“八一”南昌起义，紧接着举行了八七会议，确立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总方针，号召主要省区的党组织发动和领导农民暴动，建立工农革命军队和革命政权。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下，苏北的如皋、泰兴地区于1928年举行了五一农民暴动，并由此建立了红军游击队。1929年八九月间，陈云参加江苏省委常委会并兼任农委书记，此后多次听取南通地区党组织负责人的汇报，还对南通县委工作做过部署，发过指示。1929年11月的省委第二次代表大会第七次会议上，他在题为《江苏农民运动的趋势和今后的斗争》的报告中，充分肯定了南通、如皋、泰兴等地的游击战争形势。会议期间，他还同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江苏省委书记李维汉、省委常委李富春等人一道，听取了通海如泰地区党组织负责人关于武装斗争情况的汇报。1930年1月，省委同时发出《关于建立和扩大红军工作给各地党部的通知》和《江苏省委给泰兴、如皋两县同志指示信》，为如泰通海地区建立红军奠定了思想和组织基础，而后者正是陈云同志修改定稿的。2月，中央军委决定在苏北已有游击队的基础上，正式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14军。9月，江苏省委总行动委员会改为江南省委，管辖江苏（包括上海）、浙江、安徽三省党的组织，陈云同志兼任省委组织部长、外县工作委员会书记等职。10月，他在江南省委扩大会议上所作的关于农民运动的报告中，提出要克服红军中存在的“左”的错误和密切与群众联系的问题。月底，红14军终因寡不敌众而失败。通海特委书记、南通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刘瑞龙奉命撤到上海，成为江南省委外县工作委员会成员，不久后又接任了陈云同志所兼任的外县工委书记一职。此后，陈云同志陆续担任由江南省委改组成的江苏省委书记、中央特科主任、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常委等工作，直至1933年赴中央苏区。与此同时，刘瑞龙同志也一直在上海从事地下斗争，直到1933年赴川陕苏区。所以，把这件文物捐给南通，有助于表现陈云同志与南通革命历史的关系，可以充分表达南通人民对陈云同志的敬仰之情。

第二，我父亲朱理治不仅是从南通走出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而且还是陈云同志的老部下，曾长期在陈云同志领导下工作，与陈云同志结有深厚的革命友谊。20世纪30年代初，我父亲就在上海从事地下斗争，先后任过社会科学研究会会长、党团书记，中央巡视员，共青团江苏省委组织部长、书记等职。1938年，他在河南省委书记任上回延安出席党的六届六中全会，见到了陈云同志，并同他及全体与会人员一起合影留念。1940年5月，他回延安述职，陈云同志作为中央书记处成员、中央组织部部长，听取了他关于河南党的组织工作及今后工作设想的汇报，对他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1944年3月，陈云同志任西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兼政治部主任，我父亲也在办事处任工作会议成员兼计划委员会主任。1945年11月，陈云同志任中央北满分局书记，点名把我父亲由吉林洮南调到哈尔滨做分局秘书长，其间还送给他一件棉大衣（我已捐给沈阳军区后勤博物馆）。1946年，陈云同志任中央东北局副书记兼东北民主联军副政委期间，致电正在朝鲜执行特殊任务的萧劲光同志和我父亲，指示他们与朝方商谈贸易及保持朝方与我南满的交通运输线等事宜。此后，我父亲被任命为中央东北局暨东北民主联军驻朝鲜全权代表，留在朝鲜，负责领导东北局驻平壤办事处，致力于把朝鲜变为我东北解放区的隐蔽后方，重点支援南满作战。10月底，中央决定陈云同志兼任南满分局书记及辽东军区政委，由哈尔滨绕道朝鲜，中途下榻平壤办事处，并从那里赴中朝边界的临江县，领导南满军民胜利进行了“三下江南、四保临江”的斗争。1948年7月，陈云同志回到哈尔滨，兼任东北财经委员会主任；我父亲也被调回国内，担任东北军区后勤部副部长兼秘书长。10月底，陈云同志率领特别军管会接收沈阳，点名让我父亲担任军管会后勤处处长。随后，我父亲又在他的领导下，先后担任了东北银行总经理兼东北人民政府总会计局局长，东北计划委员会副主任、主任。1949年5月，陈云同志调任中财委主任；我父亲也于1951年9月被调到中财委，先任计划局副局长兼全国国营企业清产核资委员会副主任，后改任物资分配局局长。1958年6月，陈云同志任新成立的中央财经小组组长，又点名要我父亲去做小组成员兼秘书长。随后，我父亲陪同他前往兰州、武昌出席西北、华中协作区会议，其间还视察了兰州郊区的农业生产和玉门油矿、武汉钢铁公司。“文化大革命”后期，我多次陪同父亲去看望过陈云同志。1978年初，我父亲因患癌症病危，陈云同志听说后，立即赶往医院探视，并在他逝世后，向追悼会送了花圈。1993年，我父亲的纪念文集即将出版，他又欣然命笔，为文集题写了书名。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我父亲和刘瑞龙同志之间，不仅是南通老乡，同时也是战友和至交。1939年，我父亲任中央华中局委员兼组织部部长、代理书记期间，刘瑞龙同志曾在华中局领导的豫皖苏区委担任副书记。新中国成立后，我父亲和刘瑞龙同志又同在经济战线工作，经常见面。粉碎“四人帮”后，我亲眼看到刘瑞龙同志来我家，与我父亲畅谈。他的孩子告诉我，他晚年说过，他当年之所以走上革命道路，与受到我父亲的影响有很大关系。所以，把这件遗物捐给南通，也有助于反映陈云同志和南通籍老一辈革命家的关系，可以充分表现老一辈革命家之间的深厚友谊。

第三，我本人是陈云同志于1981年点名去他办公室担任秘书的，也是他点名让我担任他办公室负责人和党支部书记的。他对我从思想到学习，从生活到身体，给予了无微不至的关怀。我在他那里工作的四年，曾亲眼目睹、亲身感受了他信念的坚定，工作的务实，思维的辩证，作风的民主，耳濡目染，受益颇多，是我一生中最为宝贵、收获最大的时光。所以，把这件文物捐给南通，也是为了充分表达我对陈云同志的深切缅怀之情。

第四，陈云同志的家乡上海青浦建有国家级的陈云纪念馆，但那里已有陈云同志家属捐赠的大量文物。陈云同志战斗、工作过的其他地方，也有数量不等的文物。所以，把这件文物捐给南通，可以弥补这里没有革命领袖文物的缺憾，有利于南通更好地开展革命历史的学习、宣传和革命传统及爱国主义的教育。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陈云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指出：“陈云同志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和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为党和人民事业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在20世纪中国苦难而辉煌的历史进程中，涌现出一大批用特殊材料制成的优秀共产党人。陈云同志身上表现出来的坚定理想信念、坚强党性原则、求真务实作风、朴素公仆情怀、勤奋学习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他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大会上，当讲到深切怀念为我们党和国家作出重大贡献的老一辈革命家时，再一次提到了陈云同志的名字。我衷心希望南通革命纪念馆能十分珍惜陈云同志的这件遗物，并以授赠陈云同志遗物为契机，更加深刻地理解习近平总书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等一系列论述，进一步发挥好纪念馆的革命教育基地、党的宣传阵地和“红色基因库”的作用，为弘扬革命精神、传承红色基因，为南通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